



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

大学语文_下

D A X U E Y U W E N

主编 赵明剑 刘素军

副主编 郭庆杰 顾素芝 常彦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

大学语文

(下)

主编 赵明剑 刘素军

副主编 郭庆杰 顾素芝 常彦

国防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大学语文是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全书分上、下两册,内容包括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应用文写作四大部分。本书充分借鉴、吸收了国内现有大学语文教材的特色优点,特别针对当前大学生传统语言文化根基的状况编写而成。本书以文学史发展脉络为经,以著名作家作品为纬,体例新颖,选文经典,且突破了传统教材的选篇范围,更注重突出新颖性、多样性、实用性等特点。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非中文专业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通用教材,也可作为文学爱好者增长知识,开阔视野的文学读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语文. 下/赵明剑,刘素军主编.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9
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
ISBN 978-7-118-06511-4

I. 大... II. ①赵... ②刘... III. 汉语—高等学校—教材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5130 号

※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北京奥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 1/4 字数 457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总定价 66.00 元 上册 34.00 元
下册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 (010)68428422

发行邮购: (010)68414474

发行传真: (010)68411535

发行业务: (010)68472764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赵明剑 刘素军

副主编 郭庆杰 顾素芝 常 彦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彦丽 王兴为 刘素军 乔 翔 齐 涛

张 庆 郭庆杰 赵 宵 赵明剑 顾素芝

常 彦

主 审 郭庆杰

前言

爱因斯坦说：“对世界名著、文学名著没阅读、不欣赏的人，等于高度近视的人不戴眼镜。”大学语文作为针对普通高校非中文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素质教育课程，在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等方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在全日制高校设置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

随着新世纪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学语文教材也应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努力增强教材的吸引力。在适应学生口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和校正学生的兴趣，以提高他们对母语文化的重视程度。

为使语文教材更好地解决目前大学生人文素质提高的要求及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吸收并渗透到教材中去，在编写体例、内容选择、教法安排等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是大胆的尝试。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一、新颖性。在体例上，打破传统的纯文选模式，代之以文史结合的编撰体系。本教材将中外文学史分阶段在作品选之前用概述的形式加以介绍，不仅能使学生了解中外文学史的简单框架，梳理以往所学的文学史知识，还能使学生在某一部文学作品时，能将其融入特定的时空领域进行整体的理解把握，而不至于将其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阅读与学习。

二、多样性。本书不仅注意各种文体的合理安排，充分考虑不同时代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及其作品的代表性，而且让学生接触不同的思想、文学流派和风格，以开阔他们的人文视野，并在学习、比较、撞击中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学会以多元化、开放的眼光审视人类文化遗产。

三、实用性。本书古文部分的编写采用了正文与解释左右相对照的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教，而且有利于学生的自学。文后的思考与联系、学习指津、拓展阅读不仅能使学生对本篇文章进行深入思考，而且能使学生在把相关的知识点举一反三、融会贯通。鉴于非中文系大学生作文水平普遍较弱的情况，我们还加大了写作方面的指点与练习，这对肯定是有裨益的。

本书由赵明剑、刘素军担任主编，郭庆杰、顾素芝、常彦担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人员和具体章节为：赵明剑、乔翔、齐涛古代文学部分，顾素芝诗歌部分；郭庆杰、刘素军、马彦丽现代文学部分；常彦外国文学部分；张庆、王兴为、赵宵实用文写作部分。

在编写过程中，本书还参考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及其他大学语文教材一些有益的内容，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虽然我们力争精益求精，但鉴于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下)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	315	郁达夫:《故都的秋》.....	372
郭沫若:《炉中煤》.....	332	茅盾:《香市》.....	375
闻一多:《发现》.....	334	巴金:《怀念萧珊》.....	380
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	336	沈从文:《箱子岩》.....	389
徐志摩:《再别康桥》.....	338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393
艾青:《我爱这土地》.....	340	余秋雨:《道士塔》.....	406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342	史铁生:《我与地坛》.....	410
鲁迅:《灯下漫笔》.....	344	张洁:《拣麦穗》.....	423
梁实秋:《谈时间》.....	350	鲁迅:《风波》.....	426
钱钟书:《论快乐》.....	353	吴组缃:《莱竹山房》.....	431
朱光潜:《选择与安排》.....	357	老舍:《断魂枪》.....	436
《咬文嚼字》.....	361	孙犁:《嘱咐》.....	441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365	曹禺:《日出》(第二幕).....	447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概述	459	雪莱:《西风颂》.....	470
夏尔·波德莱尔:《时钟》	462	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474
弗兰西斯·培根:《论学问》	464	裴多菲:《我爱.....》.....	475
歌德:《普罗米修斯》(外一首).....	466	泰戈尔:《第一次的茉莉》.....	476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四十六首》	469	莫伯桑:《米龙老爹》.....	477
.....	469	契诃夫:《苦恼》.....	482
.....	469	托尔斯泰:《舞会以后》.....	486

实用文写作

应用文概述	492	决定	498
公务文书	498	通告	503
.....	498	通知	504

通报	508	演讲稿	540
报告	512	求职信	543
请示	519	广告	545
函	522	学术论文	558
其他文书	525	毕业论文	563
计划	525	申论	572
总结	529	参考文献	586
述职报告	534		
调查报告	538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

20 世纪, 中国文学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百年进程, 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文学和港台文学等专题加以论述。

诗歌

“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的, 而新诗的改良运动则是从诗歌的形式解放入手。早年梁启超设计“诗界革命”时, 就是要以“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来打破诗歌传统, 但由于在具体创作上的保守倾向, “诗界革命”最终止步于对宋诗派的模仿。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诗运动, 正是选择了梁启超后退之处, 而作为理论出发点与进攻方向。胡适的主张可以简单概括为“用诗如作文”、“作诗如作文”。可以看出晚清时期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的影响。

在一片反对声中新诗仍然站住了脚。从 1917 年《新青年》4 卷 1 号发表第一批新诗(胡适的《鸽子》、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月夜》等), 到 1920 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 不过三年时间, 新诗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读者群, 作品销量大增。

早期白话诗主要发表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学灯》、《觉悟》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上。第一批白话诗人, 如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 连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也都写过新诗, 这说明新诗与“五四”思想革命的密切联系。1922 年, 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等以中国新诗社名义创办了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

在早期新诗中, 从旧诗词曲脱胎而出的白话诗歌作品, 有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周作人的《小河》、朱自清的《毁灭》。其中, 周作人的《小河》被胡适评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出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1921 年郭沫若的《女神》出版, 以狂飙突进的精神展示了“五四”精神, 诗歌塑造了自我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以自由诗的形式和雄奇的风格为新诗开拓了道路。1922 年, 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等出版了他们的合集《湖畔》; 同年还出版了汪静之的个人诗集《惠的风》; 1923 年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文学史上称这四位诗人为“湖畔诗人”。“湖畔诗人”天真、开朗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表现了诗人个性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 与《女神》中叛逆、创造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是互相补充的。

1923 年, 冰心的《繁星》与《春水》, 以及宗白华《流云小诗》的出版, 引起了人们对“小诗体”的关注与兴趣。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 表现作者的刹那感受、寄寓人生的哲理或美的情思, 由客观描写转向内心。篇幅短小, 却包含了广阔的内涵, 在新诗发展历史上具有过渡意义。

新月派诗歌是中国新诗创作进入自觉时期的标志。1927 年前, 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为基本阵地, 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梦侃、孙大雨等组成前期“新月派”, 一是要在新诗与

旧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二是把创造的重心由“白话”转移到“诗”自身。

所以，他们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和形式格律化的主张。在创作中将直抒胸臆变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注重诗歌韵律的“和谐”、“均齐”，强调诗歌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主要作品有闻一多的《红烛》、《死水》，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为要寻一个明星》；朱湘的《夏天》、《草莽集》。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提出“纯诗”的主张，认为诗是“内在生命的反射”，是“真实生活的象征”，要求诗歌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应创作纯粹的诗歌。主要诗人、诗作有李金发的《微雨》、《为幸福而歌》；穆木天的《旅心》；冯乃超的《红纱灯》；王独清的《圣母像前》等。早期无产阶级诗歌也在此时出现，如蒋光慈的《新梦》。

1932年9月，中国诗歌会成立。它是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作为前驱诗人的殷夫以自己生命献给了革命与诗歌。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有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卢森堡）等人。

在这一时期，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创作，在艺术表现上大都采取描摹现实的方式。殷夫的《1929年5月1日》就形象地再现了1929年五一游行的全过程。在诗歌形式上，中国诗歌会诗人提出了“歌谣化”的主张，强调诗歌应当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而成为民众歌唱的东西。他们还出版“歌谣专号”等，希望诗歌成为群体的听觉艺术。主要的诗作有蒲风的《茫茫夜》、《迎着狂风和暴雨》；穆木天的《在喀林巴岭上》；殷夫的《孩儿塔》等。

在20世纪30年代诗歌中，在中国诗歌会之外，值得注意的诗人有臧克家和他的《烙印》。此外，后期新月派的诗歌，如徐志摩、林徽因、饶梦侃、陈梦家、李惟建都是开一代新诗风的诗人。30年代现代派诗人是由后期新月派和20年代末的象征诗派演变而来的。现代派诗人主要有戴望舒和“汉园三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以及废名、林庚、李白风、金克木等。

“七七事变”以后，民族解放战争的号角吹响，诗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四十年代的代表诗人是艾青，他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完成了历史的“综合”。一方面，坚持中国诗歌会“忠实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克服并摒弃其“幼稚的叫喊”的弱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诗。艾青的诗歌主要有《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给太阳》等。艾青的诗歌从感觉出发，注重诗歌的色彩，强调捕捉瞬间感受，具有广阔的象征意义。

七月诗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以《七月》及以后的《希望》、《诗垦地》、《诗创作》、《泥土》、《呼吸》等杂志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青年诗人群，主要代表诗人有鲁藜、绿原、冀沔、阿垅、曾卓、芦甸、孙铤、方然、牛汉等人。他们以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自由诗体为主要旗帜，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诗歌创作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大都收集在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七月新丛》与《七月文丛》的诗集中。1981年，又编辑出版了《白色花》，收集了七月诗派的20位诗人的作品（包括1980年以前的诗作）。

绿原，被公认为是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终点，又是一个起点》、《伽利略在真理面前》、《你是谁？》等名篇。鲁藜则代表七月诗派的另一种调子。他的代表作《延安散歌》、《红的雪花》、《草》都是生长在新的土地上的“绿草”，清新而明丽。阿垅的《纤夫》、冀沔的《跃动的夜》、曾卓的《铁栏与火》、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化铁的《暴雨雨岸然轰轰而至》都是充满力度的、足以显示“七月风”的代表作。

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敌后根据地，文艺为无产阶级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

主流意识形成。在此时,“诗的歌谣化”发展到了极致,“诗歌平民化”的命题被发展到极端。诗歌在此时的特点是:①与“新歌谣”一样,歌颂新思想,新生活。②诗人主体的消失,抒情被放逐。此时的诗歌要表现群体情感,描写群众斗争和劳动生活,抒发个人感情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遭到批判。③追求语言的朴实,尽量吸收口语、土语进入诗歌,节奏明快、韵律自然。诗歌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其堪称歌谣体新诗的代表作。

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段时间,胜利者的政治抒情诗、颂歌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空洞的抒情、概念化的叙事、散文化的口号式的语言成为诗歌的时代特色。20世纪50年代诗歌写实倾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叙事诗异常“兴盛”;一方面抒情的短诗都留有人物、事件、场景的框架。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石方禹的《和平最强音》、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为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叙事诗主要作品有李季的《菊花石》、《杨高传》;田间的《长诗三首》、《英雄赞歌》;臧克家的《李大钊》;郭小川的《将军三步曲》、《一个和八个》;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还有部分青年诗人写出了清新、自然的诗歌,他们的创作旨意与时代并无不同,但他们以自己生活过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为背景进行写作,运用民间传说、比喻等手法,避免了肤浅的描写和政治概念的演绎,如闻捷的《天山牧歌》、公刘的《卮瓦山组诗》等。

20世纪50年代,胡风冤案和反右运动对于当代诗歌是一个极大的摧残。“文革”期间几乎是没有任何诗歌。即使从事地下创作的诗人有创作,也无法发表,公开发表要等到80年代。一些受到迫害、失去写作权利的诗人在流放期间写下了自己的体验,如牛汉、曾卓、绿原等。反右以后,诗人中的“右派分子”蛰居期间也创作了自己的作品,如流沙河、黄永玉等。值得注意的是穆旦(查良铮)在多年停止写作后,于1975年—1976年间创作的作品,如《智慧之歌》、《冥想》、《友谊》等,都是当时诗歌的优秀作品。1976年,为了悼念周总理,抗议“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革命群众创作的“天安门诗歌”是诗歌史上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

在“文革”期间,进行创作的还有处于当时革命浪潮中的“知青”,影响比较大的有食指、《海洋三部曲》、《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等。“文革”期间,青年诗歌写作形成规模的是“白洋淀诗群”。1969年后,一批北京知青到白洋淀地区插队。他们中的根子(岳重)、多多(栗士征)、芒克(姜世伟)、林莽(张建中)等,其他地区的知青关系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有北岛、江河、严力、郑义等。白洋淀诗群的主要作品有发表于民间刊物《今天》的诗歌,还有《芒克诗选》(出版于1989),根子的《白洋淀》、《三月与末日》(1971—1972),多多的《里程》、《行礼38行》。他们的诗歌创作,成为80年代后“朦胧诗”的先声和准备,也是90年代大陆民间诗刊的源头。

“文革”以后,特别是80年代,诗歌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诗人可以多方面地获取诗歌“资源”。“五四”以来的新诗得以重新审视,西方文学思潮涌入,港台诗歌理论的介绍,都促进了诗歌的发展。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诗歌刊物明显增多,诗歌增加了发表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初,诗歌创作主要是归来者的诗歌和朦胧诗。归来者主要是“胡风分子”、“右派”和“文革”搁笔的诗人,如艾青、绿原、曾卓、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牛汉、郑敏、蔡其矫、昌耀等。他们的诗歌,或反思“文革”灾难,或反映实际生活,或沉思知识分子命运,或探索生命悲剧的意义,都具有很高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作品有艾青的《归来的歌》、曾卓的《悬崖边的树》、绿原的《又一个哥伦布》、黄永玉的《天安门即事》、公刘的《哦,大森林》、邵燕祥的《历史的耻辱柱》、牛汉的《麋子,不要朝这里奔跑》及昌耀的《慈航》等。

与归来者并行的是“新潮诗歌”。主要是北岛、舒婷等青年诗人的创作。1978年12月,民间诗刊《今天》创刊号出版。虽然到它停刊的1980年只出了9期,可后来称之为“朦胧诗”的

主要作品都已经在此刊登。出刊物外，还在“今天丛书”名目下印行了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滩》、江河的《从这里开始》。“隙曦诗”主要代表诗人与作品有北岛的《回答》、《结局或开始》，舒婷的《双桅船》、《致橡树》，顾城的《黑眼睛》，江河的《纪念碑》、《葬礼》及杨炼的《大雁塔》、《诺日朗》。

在“朦胧诗”尚未退潮时，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开始涉足诗歌。他们大多出生于60年代，对于“文革”有着不同的记忆。同时，50年代以来判断事物的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模式被打破，后起的诗人感到当代诗歌在语言、文本方面的缺失，希望在这些方面进行开拓和实验。所以，1984年前后被称为“后朦胧诗”或“第三代诗”的诗人、诗作、诗歌社团、诗歌刊物出现。“他们”的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吕德安、小君、陆忆敏、朱朱等以及民间刊物《他们》。

“海上诗群”的主要诗人有默默、刘漫流、孟浪、王寅、陈东东等。1984年开始，四川成为“新生代”诗歌最活跃的地区。例如，“非非主义”以及周伦佑、蓝马；“整体主义”以及石光华、杨远宏、刘太亨等；“新传统主义”以及廖亦武、欧阳江河等；“莽汉主义”以及万夏、李亚伟、胡冬等都出现在四川。

“女性诗歌”如翟永明、陆忆敏、唐亚平、伊蕾等；“海上诗群”的焦虑、绝望、反讽、幽默的交替运作，“女性主义”诗人性别意识的强调，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诗歌的多元发展和探索。

在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诗人、作品还有海子和他的《太阳》七部书；骆一禾的《世界的血》、《大海》；四川的祖诗《厄运》、《芳名》；王家新的《瓦雷金诺叙事曲》、《词语》；于坚的《感谢父亲》、《档案》；陈东东的《独坐酒亭，我们该这样去读古诗》；臧棣的《燕园纪事》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的出现，诗歌刊物萎缩。可这并没有使诗歌衰落，更新的诗人、诗歌作品在不断出现。如伊沙提出“饿死诗人”的口号。80年代兴起的口语诗歌发展到极端，民间诗歌刊物风起云涌。“盘峰诗会”所谓“民间诗人”与知识分子的论争，“下半身”出现，“70后”诗人的崛起等。特别是互联网的作用，诗人、诗歌作品以极其快的速度传播。所有这一切，都带来90年代诗歌在体制外、刊物外和出版外的活跃。

散文

中国是一个散文的国度。“散文”一词出自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现代中国文学的开始，应该说首先是从白话的散文和诗歌开始的。

“五四”时期，是散文革故鼎新自由发展的时期。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第4号起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白话杂文，形成了《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主要作家有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是《新青年》作家的主将，又是《语丝》派的坛主之一。此期间写下的《自言自语》、《古城》等篇什，意境深远而美丽，是现代散文诗最早出现的精品。但引起文坛普遍注意并长久被视为散文诗经典的作品，还是1920年写的《野草》。而写于1926年的《朝花夕拾》则表现了另一种优美余裕的风致。鲁迅和他的杂文、散文更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绝美景观。同时，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自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自《新表年》到《莽原》、《语丝》，直至30年代以后的《萌芽》、《太白》、《中流》，可以找出一条散文发展轨迹。

周作人是现代散文的大家。他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了一块新的土地”。以后，他又形成了一整套的散文理论，中心

是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提倡“言志”的小品文,认为这种小品文是“个人的文学尖端”。“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周作人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喝茶》、《乌篷船》等都是现代散文的名粹。许多日常生活的小事,一经过他的笔墨点染,就透露出某种人生滋味,有特别的情趣。尽管那种情趣可能未免落寞、颓废,适合所谓“中年心态”。

与周作人的言志散文风格相近,形成同一流派的散文作家作品还有俞平伯、钟敬文、冯文炳(废名)等。俞平伯的散文多收在《杂拌儿》、《燕知草》等集中,如《陶然亭的雪》、《清河坊》、《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在20年代曾受到部分读者的喜爱。钟敬文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荔枝小品》的题记里曾承认“我的文章,很与周作人先生的相像”。他善于写咏物小品,如《荔枝》、《茶》、《黄叶小谈》;也写许多情思清朗的游记,如《钱塘江的夜潮》、《太湖游记》等,追求平远清隽的美学风格。冯文炳的每一个集子,几乎都是周作人写的序。他的作品专写农村乡镇宁静生活里的人事,对小人物充满同情。《竹林的故事》等名为小说,实际上是散文。以冲淡为表,传达出朴素哀伤的情怀。

“五四”散文创作,坚持缜密、追求漂亮的作家人数比冲淡一派多。主要是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冰心体”散文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清丽风格,得到了许多青年的喜爱。她的《往事(一)·七》、《山中杂记之七——说几句爱海的孩子话》都空灵缠绵、纤细澄澈。

朱自清是极少数能用白话写出脍炙人口名篇的散文家。他的重要性如很多评论家所公认。《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绿》、《荷塘月色》是他写景抒情的名篇,体现出作者对自然景物的精确观察,对声音、色彩的敏锐感觉,通过千姿百态、或动或静的鲜明形象,巧妙的比喻、联想,融入自己的感情色彩,便构成细密、幽远、浑圆的意境。《背影》以写实的手法叙说父亲送别儿子的一段场景。以不可言说的、典型的细节注入对父亲的至深亲情,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旧世界、旧家庭已经垂垂老矣、无力呵护自己的后代子女,只能任由他们去飘零流浪的无奈。

丰子恺于20年代中期开始写小品,结集的有《缘缘堂随笔》。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以某种佛理的眼光去观察生活,在世俗中发现事理,将琐屑的事物叙说得娓娓动听。笔触平易朴实,文章萧疏淡远。

梁遇春的散文受英国的 Essay 影响很大。《春醪集》、《泪与笑》收入20年代的随笔。他喜欢甩絮语笔讽,随意坦诚中不乏睿智与思辨。文学研究会的其他作家的散文作品主要有,许地山的《空山灵雨》,叶圣陶的《藕与莼菜》、《五月卅一日急雨中》,郑振铎的《山中杂记》、《六月一日》,茅盾的旅日时期的散文收入《宿莽》集,其中《叩门》、《雾》、《卖豆腐的哨子》都显示了他的文学气质的另一面。作为成熟的散文家,他的作品在30年代更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研究会作家、早期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他的《饿乡记程》、《赤都心史》是散文也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先声。他后期的杂文可与鲁迅媲美,他的临终绝笔《多余的话》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显现出悲壮雄浑的格调。

在“五四”时期,创造社的散文也是不可回避的。郁达夫坦诚、率真、热情的散文,使他成为独树一帜的作家。他认为,现代散文“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他的《归航》、《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一个人在途上》都写得恣肆酣畅、情感充沛。

此外,“语丝派”散文也有不少佳作。如林语堂的散文在20年代提倡“幽默”、“闲适”,活跃了散文创作,拓宽了散文文体探索的道路。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创办了《人间世》与《宇宙风》两刊,都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他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

可取材”。30年代是林语堂散文创作的高峰期，从1932年《论语》创刊到1936年去美国，他的散文有《剪拂集》、《大荒集》、《我的话》等，都是与现实拉开距离，以自由主义立场写“热心冷眼看人生”的文章。

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处于国民党当局的围剿中。但还是出现了许多文学期刊，如《海燕》、《萌芽月刊》、《北斗》、《文学》、《杂文》、《芒种》等。同时还出现了新的杂文、散文作者，影响比较大的有瞿秋白、茅盾、唐弢、徐懋庸、聂绀弩。他们基本上都是杂文，如“鲁迅风”，简明、犀利，贴切泼辣，如唐弢的《谈礼教》、《看到想到》，徐懋庸的《泼“臭料”》、《上帝的心》等。聂绀弩(1903—1986)是杂文的重要作者之一。他成名在30年代，大量创作杂文是在抗战以后。结集的有《历史的奥秘》、《蛇与塔》、《早醒记》与《血书》等。散文作家、作品有茅盾的《风景谈》、《白杨礼赞》，艾芜的《漂泊杂记》、《山中牧歌》，吴组缃的《黄昏》、《泰山风光》，萧红的《过夜》、《蹲在洋车上》等。

20世纪30年代，聚居北京的“京派”作家写出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何其芳、李广田、吴伯箫、师陀、沈从文、萧干都是京派卓有建树的散文家。何其芳为著名的散文集《画梦录》的作者。他的散文希望证明每一篇都是独立的创作，追求纯粹的柔和和美丽。他的《梦后》、《岩》、《黄昏》、《雨前》都是精致的美文，透着感觉的朦胧意象进行组合和拼贴，而编织成美丽的心灵感应世界。

李广田与何其芳、卞之琳合出过《汉园集》，他也是诗人，但主要成就在散文上。他有过类似何其芳的思想和文学历程，但两人的风格迥异。他写于抗战前的《画廊集》、《银狐集》、《雀蓑集》等是描写故乡的野花、草叶、村俗风景，文笔醇厚、自然平和，追求朴野无奇的境界，“使人在平庸的事物里，找到美和真实”。与李广田风格相近的还有吴伯箫，他这一时期所写的散文多收入《羽书》，《山屋》、《马》、《羽书》是他的名篇。

与“京派”文人一样，在抒情小品的创作方面有突出建树的还有缪崇群、丽尼和陆蠡等人。缪崇群于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此后十余年间出版了《唏露集》、《寄健康人》、《废墟集》、《夏虫集》、《石屏随笔》和《眷眷草》等六部集子；丽尼的散文集有《黄昏之献》、《鹰之歌》；陆蠡有《海星》和《竹刀》。

此外，还有“开明派”散文家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他们都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同事。叶圣陶此时的散文大多收入《未厌居习作》，夏丏尊是丰子恺的老师，他的著名作品有《白马湖之冬》、《钢铁假山》、《猫》等。丰子恺开始关注现实，描写灾难，有《肉腿》、《半篇莫干山游记》等。

20世纪40年代，在国统区艰苦环境下坚持杂文创作的作家、作品主要有聂绀弩的《蛇与塔》、《历史的奥秘》、《早醒记》等；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等。解放区的杂文主要集中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一段时间，当时的《解放日报》、《谷雨》、《抗战文艺》都刊载过杂文，重要作品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与尊重作家》。

1937年到1941年，“孤岛时期”的上海，值得注意的作家是张爱玲，她的散文大多收入《流言》。

抗战时期的散文作家、作品较为突出的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怀念鲁迅先生》，巴金的《醉与梦》、《黑土》、《龙·虎·狗》等。

1949以后，散文的发展进入了另一个阶段。50年代初，纪实性的通讯、报告文学、特写在散文中占据绝对分量。当时的创作有两大主题：一是歌颂新时代，描述社会主义建设；一是表现抗美援朝的英雄行动。主要作家有巴金、刘白羽、杨朔、黄钢、菡子等。其中以魏巍

的创作影响最大。随着通讯报告的发展,散文小品却处于被削弱的地位,佳作寥寥。50年代中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散文有所复兴。1956年和次年的短暂时间里,散文在题材、风格等方面有了一些变化,流露出“复兴”的迹象,出现如老舍的《养花》,丰子恺的《南颖访问记》,钦文的《鉴胡风景人酉》,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秦牧的《社稷坛抒情》,杨朔的《香山红叶》,魏巍的《我的老师》,川岛的《记重印游仙窟》等。

散文的另一次“复兴”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1961年元月起,《人民日报》在第8版开辟“笔谈散文”专栏,接着其他报纸也开始谈论散文的创作和题材。冰心、吴伯箫、秦牧、徐迟、黄秋耘、郭预衡、萧云儒等都发表见解。因此有人称1961年为“散文年”。在两年的时间里,散文的成绩表现为:“散文作家”队伍的形成;发表、出版了体现当时水准的作品;杨朔、秦牧、刘白羽散文模式的形成。同时,散文的局限也明显存在:难以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作家艺术方法的选择和借鉴受到限制;由意境的营造带来的对于真实苦难的掩饰。这段时间散文的主要作家、作品有《花城》(秦牧)、《东风第一枝》(杨朔)、《红玛瑙集》(刘白羽)、《花》(曹靖华)、《樱花赞》(冰心)、《北极星》(吴伯箫)、《风帆》(袁鹰)、《初晴集》(菡子)、《珠江岸边》(陈残云)。

20世纪60年代后期,“文革”摧残了文学艺术的创造。散文这种以心灵、情感为主要因素的文学艺术基本没有什么好的作品出现。丰子恺、谢璞于1972年分别发表了《吃酒》、《珍珠赋》,前者写情趣,技巧娴熟;后者写“学大寨”。虽不脱时代气息,名重一时,但摆脱了八股形式。

20世纪80年代开始时,作为60年代初散文“复兴标志”的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仍在读者中有很影响,作家也在沿袭他们的模式。如贾平凹最初的《丑石》、《月迹》等仍然不脱杨朔散文的模式。散文面临突破60年代的模式,回归个人体验,创新散文艺术的重任。80年代初,反思“文革”灾难,描述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呼唤“心交给读者”,“讲真话”,作家、作品有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民族悲剧,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不久,散文中出现了侧重“自我”经验的书写,由对社会主题的呼唤转向对个人心境、情感的表达,语言也更加注重个性的作品。孙犁的《晚华集》、张洁的《拣麦穗》、唐敏的《心中的大自然》等都是这方面的上乘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散文的“自我表现”逐渐推向深入,面向人的感觉、情绪、意识流,着力表现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创作出了一批“朦胧散文”,也称“新散文”。主要作家有赵玫、周佩红、刘烨园、黑孩等。80年代末到90年代,散文更加多元化,余秋雨、王充闾等的“文化散文”,张中行、贾植芳等的“学者散文”,周国平等的“哲理散文”,史铁生、叶广岑等的“生命散文”,刘小枫、张承志等的“宗教散文”,唐敏、叶梦等的“女性散文”,大仙、王俊义等的“现代散文”等,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拓宽了散文的创作题材,在散文艺术的探索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有的作家将小说、戏剧的创作方法引进散文,使散文的形式、语言、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小说

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小说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是从“五四”开始的。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期的《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的白话创作的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开辟了中国文学(小说)发展的新时代。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除旧布新的巨大力量引出了一批“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

主要功绩是建立了现代市镇和乡土文学的基本叙述模式。有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俞平伯的《花匠》、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主要作家、作品有冰心的《超人》，王统照的《沉思》、《湖畔儿语》等。

人生派写实小说在叶圣陶以外，主要由文学研究会的乡土小说作家群组成。这些作家的成熟作品都产生于“五四”之后，王鲁彦的《袖子》、彭家煌《怂恿》的成就最大。其他如台静农的《地之子》、许钦文的《故乡》、蹇先艾的《朝雾》、许杰的《惨雾》等都有自己的特点，显示了乡土作家的雄厚实力和20年代中期写实小说的初具规模。

“五四”时期，在小说领域将“表现自我”的主观性推至极端的，是以创造社作家为主的浪漫主义抒情小说流派。创造社的作家强调小说的主观性与抒情性，作品大多有一个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作者不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刻画，以某种思想意识教化读者，而是直接抒发主人公的强烈感情去打动读者。郭沫若1920年写的《未央》、《鼠灾》就初具“自叙传”的抒情小说特征。但“自叙传”的抒情小说作为潮流涌起，还是以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小说集《沉沦》开始的。主要作家、作品有郁达夫的《沉沦》、陶晶孙的《音乐会小曲》、叶鼎洛的《前梦》及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等。

“五四”时期，也以写个人心路著称。与创造社无师承关系的还有两位女作家，即庐隐与冯沅君。前者有《海滨故人》等，后者有《隔绝》等。此外，在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发展中，以书写田园风光见长的是冯国炳（1926年起用废名的笔名），代表作品有《竹林的故事》。许地山的人生浪漫传奇小说也值得重视，他的《命命鸟》、《缀网劳蛛》情节曲折，想象丰富，注重以情感人，运用象征和隐喻展示命运，表达了作家对宗教的内在体验。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春桃》，描写了历经磨难的一个捡破烂女子，如何面对本以为死于战争，却又回归的残废丈夫，怎样爱护相依为命的同居男人，最终选择一女二男的生活方式的故事，将民间仁义与宗教慈爱结合起来，塑造了春桃的形象。

在“五四”时期，通俗小说实际上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线上的，它靠现代印刷走向读者，成为商品，但在道德观念和文学形式上却滞后于时代。新旧小说对于读者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虽然新小说气势逼人，崛起迅速，但并不能完全占领读书市场。通俗小说作品在市场中仍拥有一定的读者群。虽然它们在与新小说的争斗中败落下来，但在越来越向“俗”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也在试图加强自身的“现代性”。因此逐渐形成了现代小说雅俗分流、相互渗透的格局。通俗小说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社会小说，如海上说梦人（朱瘦菊）的《歇浦潮》、毕依虹的《人间地狱》、包笑天的《上海春秋》、徐卓呆的《浴堂里的哲学家》，张恨水的《南国相思谱》等；二是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三是历史演义，如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包笑天的《留芳记》等。

20世纪30年代，中国小说繁盛一时，小说大家除鲁迅外，茅盾、老舍、巴金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代表作（茅盾的《子夜》、老舍《骆驼祥子》、巴金《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青年小说家登上文坛后，锐意明显、创作丰硕。这个时期的小说大致有三个板块，即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作家、远离文学党派和商业机制的“京派”和接近市场和读者的“海派”。

“左联”和左翼小说主要有：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通过少年汪中的流浪历程展现了“五四”到“五卅”黑社会的矛盾与斗争。1927年4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不到半个月，就完成了《短裤党》，较早地描写了工人运动中的共产党员与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野祭》、《冲了云围的月亮》迅速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分化的状况，企图为他们指出应走的道路。

柔石的《疯人》集、长篇《旧时代之死》、中篇《三姊妹》等，以青年婚姻恋爱为题材，以

浪漫的笔致描绘他们的苦闷。后期的代表作品中篇《二月》和短篇《人鬼和他的妻的故事》、《为奴隶的母亲》能纯熟地表现青年知识者的追求，揭示了下层劳动人民悲苦的命运。

其他作家、作品有丁玲的《水》、《母亲》，描写辛亥革命后，新型女性如何走过坎坷不平的叛逆道路。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清明时节》显示了作家讽刺艺术个性的形成。蒋牧良的《赈米》、《伙食尾子》、《生死朋友》、《早》等，描写了农村、旧军队与城市公务员的生活，与张天翼取材颇为接近。此外，吴组缃的《樊家铺》、《一千八百担》，叶紫的《丰收》，艾芜的《南行记》，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都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

20世纪30年代的北方，“京派”作家的创作非常活跃。主要有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杨振声、李健吾、朱光潜、林徽因等。京派小说统一的审美情感是诚实、从容、宽厚，题材新鲜、结构完整、文字流丽。主要有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如《边城》、《长河》、《龙朱》《八骏图》等)，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桥》，萧乾的《篱下》、《车子的命运》、《皈依》，芦焚《谷》、《人下人》，杨振声的《报复》、《抛锚》，李健吾的《心病》、《陷阱》、《坛子》，林徽因的小说集《模影零篇》等。

京派小说和其他独立作家的小说都对小说的发展起到开拓作用。坚持自己独立的人生派小说写作的主要作家、作品有叶圣陶的《倪焕之》、许地山的《铁鱼底鳃》、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大波》等。海派小说的主要特点是，受市民审美趣味的牵制，与政治性、社会性强烈的主流文学拉开距离，把新文学推向世俗化、商业化，过度地描写都市，提出“都市男女”的海派文学新主题。张资平写出《苔莉》后，独自向海派发展。较值得一看的作品是《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儿女们》等。另一个色调复杂的海派作家是叶灵凤，因发表《女娲氏之遗孽》成名，主要小说集有《菊子夫人》、《鸿绿媚》、《红的天使》等。在报刊上连载过《时代姑娘》等三部通俗长篇。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风靡一时的“新感觉派”是第二代海派，也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新感觉派”的出场，表明中国在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已经进入了独立阶段。“新感觉派”是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打量上海，以现代的形式表达东方大都会城与人的神韵。主要作家、作品有刘纳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穆时英的《公墓》、《上海的狐步舞》、《黑牡丹》、《白金的女体塑像》，施蛰存的短篇集《上元灯》。施蛰存1932年主编的《现代》，以写作《鸠摩罗什》为契机，之后有意地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创作心理分析小说，遂同穆时英的新感觉派部分地合流。

从抗战爆发到40年代，国家分为国统区、解放区与沦陷区，这种时代背景很深地影响到文学，形成了国统区的讽刺和追忆小说、解放区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沦陷区的洋场通俗先锋混合小说。它们之间不断渗透、相互影响，到五六十年代或终止、或变形、或延续。

暴露与讽刺的小说主要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它以一个“包而不办”的抗战文化官僚的典型形象而著称。沙汀是抗战之中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家之一，1940年写短篇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1943年秋写长篇代表作《淘金记》。沙汀的《丁跛公》描写了旧中国农村的黑暗，幽默而沉重。艾芜在抗战环境中明显的转向暴露压迫和苦难，这个时期主要有三个长篇即《丰饶的原野》、《山野》、《故乡》。讽刺小说有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长篇小说《围城》。其他作家既表现抗战，又有暴露性的小说作品有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20世纪40年代，体验与追忆的小说比较丰富，这与胡风主持的《七月》杂志的提倡是分不开的。重要的作家、作品有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冯至的《伍子胥》，袁犀的《贝壳》、《面纱》，师陀的《结婚》，汪曾祺的《邂逅集》。属于东北作家群的作家写出了

以表现童年故乡记忆为主的作品，如萧红的《呼兰河传》、骆宾基的《童年》、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等。20世纪40年代，在沦陷区以上海为首的都市，呈现出先锋和现代通俗小说并行的局面。张爱玲的小说，既贴近都市生活，又展示人性丑陋，故事通俗、手法先锋，因而雅俗共赏，如《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连环套》都表现了女性的痛苦、挣扎与毁灭；《倾城之恋》反映在现代环境下依然顽固存在的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展示了作家天才的成分和其独特的生活积累。

苏青用平实的写实笔调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以一个女性的大胆描写了男女情事，受到了读者的青睐。从1944年初版至1948年，竟印行了18版。苏青由此成为典型的畅销书作家。

国统区先锋与通俗两栖的作家是徐许和无名氏。徐许的作品既善于编织奇幻虚渺的传奇故事，又有对于生命态度的严肃探索。他的小说从《鬼恋》、《荒谬的英法海峡》、《吉部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到《风萧萧》都显示了通俗与先锋的结合。无名氏因《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而获得成功，在通俗故事里显出并不通俗的主旨。抗战后，他隐居杭州创作的作品《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属于他的先锋时期。

解放区小说大多属于新现实主义，因情势的特别而没有先锋小说。作品大多描写解放区的新人。农村题材作品主要有孙犁的《荷花淀》、《丈夫》等，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及欧阳山的《高干大》等。

农村题材小说最重要的作家是赵树理。他的小说扬弃了传统章回小说的框架，汲取现代小说的情节、故事结构，吸收评书的写作手法，风格明快、简约、富有幽默感，实现了艺术性与大众性比较完美的结合，主要作品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传家宝》等。

军事战争题材作品有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政治委员》，邵子南的《地雷阵》，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等。

1949以后，现代小说家发生了分化，有的搁笔，有的转向，有的去逝，许多作家被忘却。坚持创作的小说家也因政治的因素而改变了创作的题材、风格和艺术手法。1949到1965年间的小说，题材雷同、形态单一。农村小说主要反映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如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等。历史小说主要表现“革命历史”题材，追求“史诗效应”。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欧阳山的《三家巷》、罗广斌等的《红岩》等。短篇小说则有以抒情、叙事方式来表现革命历史的作品，茹志鹃的《百合花》、刘真的《核桃的秘密》就属于此类。

工业题材主要表现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的劳动生活，有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及草明的《火车头》等。

在主流之外有一些受到批评的小说值得注意，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

“文革”期间流行的小说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

“新时期”以来，小说在复兴“五四”传统、发展小说艺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80年代前期，伤痕文学有《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记忆》（张弦）、《枫》（郑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等；改革文学主要有《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沉重的翅膀》（张洁）、《花园街5号》（李国文）等。反思文学坚持小说的“问题意识”，通过表现人物命运来反思1949以来的政治运动和“文革”灾难，作品有《内奸》（方之）、《“漏斗户”主》（高晓声）、《我是谁》（宗璞）、《布礼》（王蒙）、《人到中年》（谌容）及《芙蓉镇》（古华）等。